

# 一家六位侨联常委、两位政协常委

## ——记归侨赵天助家族的故事

□ 本报记者 林希

赵天助家族的故事,是一个典型的归侨家庭的故事。且听赵启安讲述家族数代人从家乡到南洋,新中国成立后向往崭新的生活,从南洋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,历经风雨彩虹,而今过着安稳晚年,儿孙学业有成的变迁故事。

赵氏家族约在宋朝从河南迁到福建省漳浦县。在他们老祖宗的墓碑上,刻着“金浦”两个大字,提醒着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来处。康熙年间迁居厦门,先辈们的墓地曾在厦门港、万寿山等地,因着城市发展,又都迁移到薛岭公

墓。这个历程,和许多老厦门人经历的相似。

赵启安的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出洋了,大约是在18世纪中叶。那个时代闽南华侨告别家乡下南洋,就是赌上了性命。可是家乡的贫瘠、家人的生计和下南洋的风潮,还是令壮年男子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航程。赵启安的曾祖父不幸在海上遇难,留下家中老小愈发艰难地度日。

赵启安的祖父长大后,踏着前辈的足迹出发,他的目的地是新加坡。可是在彼岸,他所能做的只是苦力,还是穷,没有余钱寄回家乡赡养老小。

赵天助(1884-1960)厦门市侨联常委

赵启泰(长子)厦门市政协常委、福建省及厦门市侨联常委、华侨大学校董

赵启霖(三子)福建省人大代表、厦门市侨联常委、副主席

赵启安(六子)厦门大学侨联副主席、主席

陈裕秀(儿媳)福建省政协常委、厦门市侨联常委、厦门大学侨联主席

的恩情,承担起了照顾堂叔一家生活的重任。他自己仍然保留着简朴的生活习惯,而且十分幽默风趣,人们常被“天助伯”逗得哈哈大笑。

1957年4月21日,厦门海堤建成通车,赵天助作为侨界代表登上了通行海堤的火车。他坐在车厢里,双手拄着拐杖,笑眯眯的模样定格在《人民画报》上,海外的亲朋好友也都看到了。爱开玩笑的“天助伯”又逗趣说“我被‘骗’回来了,现在我又要去‘骗’人回来了”。他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、快乐是难以掩饰的。

赵天助有生之年最欣慰的事,是看到带回国的五位子女,已有三位升读大学。赵启昌考进厦门



1954年,赵天助全家在印尼时的合影

大学数学系,赵启益考进福建中医学院,赵碧华考进福建建筑工

程专科学校。对比自己年轻时的贫苦无助,他感慨万分。

### 母亲陈意娘

在中华大家庭里,母亲常常是幕后不被重视的那位。而赵启安和他的兄弟姐妹们,都格外尊敬母亲陈意娘(1905-1984),认为父亲的成就来源于母亲的默默支持,自己的成长来源于母亲的谆谆教导。直至今日,在白鹤路的老别墅里,花砖地板,老旧的沙发,赵启安有时会回想起,母亲就坐在那里,念叨着“做人吃亏是福啊”“宽宏大量才有福报”。

陈意娘本名“陈淑意”,像东南亚许多家庭的女孩儿一样,结了婚就被唤做了“娘”。她也像东南亚许许多多华侨家庭里的女孩子

那样,接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,把“贤妻良母”当作理所当然的人生目标。赵天助做土产生意,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得在外头“趴趴走”。勤俭贤惠的陈意娘承担起了生养7个子女的重担,还要照顾赵天助前妻留下的2个孩子。如此庞大的家庭,在她的操持下,孩子们都和睦健康地成长。

回国后,孩子们长大了,结婚嫁娶,儿孙绕膝,一大家子仍然相处得很好。儿媳陈裕秀记得自己刚嫁进赵家时,一句闽南话都不会说,婆婆很和善很有耐心地教

导着她。回到国内,经济上其实是逐渐不宽裕的,孩子们的衣服缝缝补补接着穿。亲朋好友都爱到这个热闹的大家庭,到了饭点,陈意娘照样加饭加菜,热情招呼着。家里的“羚羊角”常常被借走拿去磨粉给小儿压惊,有一次还回来时竟然短了一大截。陈意娘笑笑,没有过多计较。

赵家回厦门后,认识了一个盲人家庭,来往久了发现他们经济很困难。赵天助、陈意娘决定以每月10元长年资助。父母乐于助人的精神,成了赵家兄弟姐妹及后代学习的榜样。

### 大哥赵启泰

1954年父母带着弟弟妹妹们回国时,长子赵启泰(1923-2012)留在了印尼,家中的产业需要他。他写得一手好字,精通中文、印尼文和荷兰文。不仅生意做得好,还热心华侨华人社会的工作。曾担任印尼泗水中华总商会秘书长、印尼泗水侨联秘书长。万隆会议时,他参与了保卫周恩来总理的工作。两次排华事件中,他做了大量帮助难侨回归祖国的工作。还协助中国驻印尼泗水领事馆做翻译工作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。1967年,赵启泰被说成是“共产党”,面临被拘捕的风险。他带着妻小一家6人,只好连夜逃走,撇下了所有生意和资产。到了广州,上岸一看,满城的大字报。

回到厦门,总算平安与家人团聚。但没多久,有大字报贴出来,说赵启泰是“台湾特务”。被限令在48小时内从虎园路的大宅子里搬出,至于一大家子二三十人何去何从,没有答案。几个小家庭或

投奔亲友或寻找临时住处,四散而居。

1972年,赵启泰迁居香港,后来与数位好友合资成立了百希达公司,任董事、总经理。他不计前嫌,积极为厦门引进技术、资金而穿针引线。厦门罐头厂的第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是从台湾引进的,比厦门第一家外资企业印华地砖厂更早,其中牵线搭桥的人就是赵启泰。百希达公司主营土特产业务,业务分布在全国各地。赵启泰做这个生意有个奇怪的原则,双方一定要双赢,损害祖国利益的生意,哪怕利润再高也不干。

在香港,赵启泰还做了大量接待内地赴港代表团的工作,厦门、北京、青岛等地都

有,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国外的商业资讯。

赵启泰回到厦门期间,历经大起大落,但他淡定从容。回忆往事时,他从不咒骂命运的不公。他也没有灰心丧气,哪怕在最低落的时候,他也告诉家人“祖国会好的”。他是位严厉又可亲的大哥。有次开政协,担任厦门市政协常委的他坐在主席台上,看到台下弟弟与邻座窃语,回到家中,他批评:“开会要认真”。长兄如父,赵启霖延续了端正爱国的家风。

(下转8版)



1961年国庆节,赵启泰(右)作为翻译,协助中国大使馆泗水临时办事处招待外宾

### 父亲赵天助

赵启安的父亲赵天助(1884-1960)3岁进入私塾读书,15岁因为家贫就去金纸厂做佣工。每天早上4点起床,5点上工,要一直做到晚上10点。这样的日子熬了四年。没有办法,家里有5口人需要吃饭穿衣。

1902年,赵天助和父辈一样下南洋,他到印尼泗水,在堂叔开的店里做店员。1938年,已经54岁的赵天助终于攒够了自己创业的资本,做起土特产生意。丁香、鱼干、水果、咖啡等,四处收购后再贩卖出去,从中赚些薄利。略有盈余后,赵天助非常开心,像绝大多数华侨一样,把自己舍不得花的钱汇回了家乡。

中间破产过一次,他不以为然,重头再来。1941年,日军入侵印尼,迫不得已,赵天助一家十多人逃难到乡下,辛苦攒下的财物毁失殆尽。赵天助生性乐观,就是这样两次破产,他面如常色,夜里照样安然入眠。

1945年,日军战败撤退,赵天助一家回到了泗水。两手空空,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诚信还在,这就是翻身的本钱。好朋友陈清安等找上门来,主动筹资交给赵天助:“这些钱你拿着,就算我们借你的,要是生意失败了,就不用还了”。之前的客户关系也都还保留着,数量、价格,说了就一定执行,信守承诺。得道者多助,自助者天助。赵天助1947年成立了泰兴有限公司,再加上儿子赵启泰、赵启霖和堂侄儿赵人庆都成了得力助手,公司年年盈利,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。

只是常年劳累使赵天助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。幸而大儿子赵启泰已可胜任托付,因而赵天助于1952年退休,到拉旺养老度假,赵启泰接过了公司生意。

这个时期,从祖国、家乡不断传来消息:共产党执政了,变了天地呢。不时有老乡、朋友来访,他们有的已经回过中国了,描述起新社会的见闻,个个眸光闪闪。特别是亲家、赵启泰的岳父,他回过

泉州晋江老家,连连感叹“不一样”。那时厦门与泗水之间有船通行,民众往来频繁。年近古稀的赵天助那颗思乡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。1953年,他汇款回国,委托中国银行房产部购置居所,准备回国养老。

1954年7月1日,思乡心切的赵天助带着妻子和年龄较小的5个孩子,从泗水登上了回国的航船。他们经过新加坡、香港,再到深圳。又从广州坐上烧煤的汽车,经汕头到厦门,大概坐了3天的车。年过70岁的赵天助一路颠簸但也一路兴致勃勃。

在民主大厦的旅社里过渡了1个月,虎园路5号的房子装修好了,全家人开启了新的生活。每天早上五点,街巷里踢踢踏踏的木屐声频密起来,粪车慢悠悠地驶过,一边还召唤着。赵天助准时起床了,喝了水仙茶后,他必定前往位于百家村的陈清安家,一边拄着拐杖一边还要哼着跑了调的南音,街坊们一听就知道“天助伯又出来散步了”。



赵天助等捐款购置的渔船

赵天助如此开心,确实是因新生活太过美好。回国不久,厦门市侨联就找上门了。赵天助加入了这个温暖有趣的大家庭,每次开会、活动,他都认真真地去参加,还说要“有始有终”。厦门市侨联要成立厦港渔业公司,需要集资买2条船,共需8万元。赵天助和颜西岳、汪万新、陈清安每人凑了2万元。那时的2万元绝对是笔巨款。华侨中学、华侨托儿所、华侨幼儿园,他也捐资了。他说自己没读什么书,一定会支持教育的。他感恩祖国给了他新生命。

赵天助也记得泗水堂叔